

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嶺南大學



屯門·香港

族群研究論叢 4

2000年3月

嶺南大學首先獲得香港崇正總會慷慨撥捐經費，於1998年開設了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計劃。作為一嚴肅的學術題目，族群和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領域，亦為中國研究提供了一新的方向和路徑。本計劃的主要目標為拓展華人研究範圍，以及提高世界各地對種族認識及華人商業研究的興趣。

「敏銳危機感」與客家人的政治成就

鄭赤琰

長征的路線主要是由客家村落打通的，同樣的事實也有人試圖從洪秀全的太平天國的領導層去作統計，也都有類似的發現，洪的領導高層也是客家人組成爲主。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也有人指出這點，雖然也有研究直接否定孫中山是客家人。

除了用統計方法去找出答案外，也有人從歷史到近代所出現的顯赫政治領袖去確立這個事實，王安石、文天祥、曾國藩、洪秀全、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李光耀、李登輝等。這些領袖顯赫的程度都在其當代或後代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這個印象絕非以量可以把他們掩蓋下去的，因此大家得到的結論是客家族人確是出了不少顯赫的政治領袖。

爲了更深一層去建立這個事實，中國的社會科學院甚至進行研究客家人與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發展關係，並從中找出深具影響的人物中那些是客家人，結果他們也發現，原來不但在政壇上有顯赫的領袖，在其他領域中也都如是，梁啟超在民權思想開放方面，陳炯明在軍事方面，張弼士與胡文虎在企業方面，陳寶箴家族在仕途方面，都是英名顯赫的。

正因爲有不少傑出人物是客家人，或是因爲客家族人出了不少赫顯的人物，因此令到中外學者興起了對客家族人的研究。這情況不是在近年才發生，早在歐美人士進入中國後，他們的知識界便對這問題興起了討論，首先是由傳教士之間展開，他們在傳教工作中發現客家人最令他們欣賞，除了他們較願意接受基督教的洗禮外，也是因爲他們肯賣力爲這些教會作出種種服務。因此被傳教士認定是個難得的族群，從而對於客家人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研究也就先在教士中展開。除了教士外，在這些教士初進入中國傳教時，也正碰上

洪秀全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因此這教士的研究興趣也就相當留意到太平天國，又因太平天國有洪秀全，石達開等大批客家人參與革命，他們的研究對象也就相當專注客家族群身上。

除了傳教的動機外，另外一股研究客家族群的興起則與政治動機有關。當歐洲勢力進入中國後，他們所碰上的政治衝擊，與客家族群有關的有太平天國之亂，爲了保護他們在中國的利益，歐洲各國曾聯合起來幫助清政府擊敗太平軍。其次是英國在佔領香港後，曾受到當地客家族群的反抗，經過了相當長時間的交手，雙方由敵視轉爲友好，英國還因此器重客家人的農業開創能力，把大批客家人由香港臨近的客家地域移殖到其殖民地去開墾農業。據阿當·史密斯的研究，英國殖民地的發展之所以能從後來者的地位超越先驅者的西班牙與葡萄牙，正是因爲英國的殖民地政策重視農業的開發多過礦業的採尋，西葡兩國則恰好相反。恰好客家三省所構成的山區地帶，要從農業打開出路條件非常惡劣，一旦風聞英國有富裕的農業殖民地，這些地區的客家人便絡繹於途，從清末到民國初年的戰亂中，不斷有客家人移居到英國殖民地，其中尤其以馬來半島與北婆羅洲爲最。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當政，被圍堵而與世隔絕，香港變成了唯一的中國通道，也爲臨的地區的客家人提供了方便移居香港、甚至其他英聯邦國家的機會。有了這些因緣際會，英國學者在其研究中國人的過程中，也就有比較多的機會去接觸客家族群，瞭解他們，從而對於他們也就有了不少褒言，主要是由於客家人不但有農業的開創精神，同時也有深厚的文化基礎。

在衆多研究客家族群的學說中，其中相當熱門的話題是涉及研究爲甚麼客家族群能夠在政治領域上出類拔萃。這方面的研究，早期要推哈佛大學的教授韓丁頓以及中國學者羅香林，較具影響力。前

者在其《種族的特性》一書中，討論到客家人的傑出因素，他給客家族群很高的評價。在第十三章的標題裏他用了「The Selection of Chinese」在達爾文的進化論裏，強調任何有生命的動植物都要經受淘汰(Selection)的規律，抵受得住淘汰，才能被選出來生存下去，韓丁頓用了達爾文的理論來看中國人種的發展，在此一章裏韓氏指出中國在歷史上曾數度經過天災與人禍，死人無數，但客家族群卻能經受數度的大遷移，逃避天災與人禍。他研究了客家人大遷移的路線，發覺生存條件非常差，即使最後定居在粵東，閩西，與贛南三角地帶的山區，生活條件依然是很考驗人，但客家族群卻能克服種種困苦，倔強地生活下去，而且在人文方面作出重大貢獻，成為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一支。

羅香林的研究則根據環境的角度去看客家人在歷史上五度大遷移中如何克服種種困難，他指出大遷移的原因是逃避戰亂。他也與韓丁頓一樣，認為要在戰亂中攜帶家人，經歷那種崎嶇的山區地帶，在長年累月在恐慌無助的條件下，生存下來，確是難能可貴。羅氏的研究追尋了客家人在長達數百年的五次大遷移的歷史，強而有力地建立了一個認識客家族群的個性與其生存能力的史實，使到很多人對於客家人的神秘感有所揭露。雖然其研究方法難免有瑕疵，但他採用了實地採訪，採訪上述山區客家的地理條件，並採用大量的族譜資料進行分析，基本上是很科學的，他的研究因此為後學重視，成為客家研究的重要文獻。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在本文作者主持下的海外華人研究社與人類學系的謝劍教授，在香港崇正總會黃石華理事長的主催下，建立了「國際客家學會」，並由此會組織了國際研討會進行對客家學展開更有系統的研究。這研討會與各國的學術機構合作，一共召開了四次國際研討會，參與的學者不下

千人，可說在同類學術研究中無出其右者。在四次的研討會中涉及的知識層面很廣，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角度深入探討，因此也對客家族的特性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因為筆者全面策劃這個客家學的研究，本身又是專業政治學的，因此對於客家族群為甚麼會在政治領域中出了不少顯赫的領袖，因此鄭重在此建議以「敏銳的危機感」的理論，去對這問題加以解釋。

所謂「敏銳的危機感」(Strong Sense of Danger)是指任何一種有社會結構的動物，其能夠維持整個群體的生存與發展，必須靠其能夠克服種種危機，在危機克服的過程中，最重要而又關鍵的一個環節是這個社會組織能有一群或一個具有特別敏銳危機感的領袖。這個社會組織會不會因碰上危機而被擊垮？關鍵在於領袖有沒有敏銳的危機感？在動物進化史上，據動物學家的觀察，能夠在「物競天擇」的遊戲規則下生存下來的，都是靠每個個體的求生本能，在長期觀察當世唯一遺留下來的一個原始動物生態環境的東非洲大草原，動物學家普遍得到一個結論：任何一個社群動物，不但整體要有「敏銳的危機感」，個體也然，否則整體或個體便容易遭受到致命的攻擊。動物學家發現，非洲羚羊，斑馬與角馬，長期生活在兇狠的獅子，豹、與狼的追殺下，資質弱的很快會被淘汰，只有強的才能生存下來，牠們身上帶着的優質遺傳因子會傳給下一代，因而產生更強的下一代。相同的，為了要面對這些更強的羚羊、斑馬、與角馬，獅子、豹與狼群也得跟着進化，體力追不上的一個家族會被餓死而淘汰，追得上而能捕殺的則會留下來，而牠們身上的優質遺傳因子也因此產生更強的下一代。這更強的下一代又會刺激與影響更下一代，雙方都得到最佳的狀態，隨時將弱質的淘汰，讓優質的衣鉢相傳。這個弱與強的判決條件不但是要有堅毅的體力去負荷長程的大遷移，同時也要有敏銳的危機感。沒有

這條件，即使有更快速更強健的體力也會受到追殺者的伏擊而喪命。非洲草原上的捕殺者與被捕殺者的最基本攻防戰略正是看誰有更敏銳的危機感。對被捕殺者如此，對捕殺者也不例外。科學家發現即使是號稱萬獸之王的獅子一族，也得要有敏銳的危機感，否則好辛苦捉來的獵物也會被狼群或禿鷹搶佔去。每次追捕的工作須要消耗大量的體力。因此每次的獵獲都是補充體力的必需食物，不能輕易失去，否則將因體力不逮而送命。這種敏銳的危機感對獵殺者來說便是如何提防其他的兇狠掠食者。

在這樣的危機面對的過程中，其中一個很關鍵的操作環節是要有一個最具敏銳危機感的領袖。不是因為他或牠當上領袖而有這個條件，領袖的先決條件在其有這優質，否則即使當上領袖也會因為危機敏感不足而斷送掉整個家族的性命。非洲的個別獅子家族之所以走上滅路，往往是因為當家的缺乏敏銳的危機感。

瞭解到一般社群的動物都得有牠們的領袖能具備敏銳的危機感以求取生存，人是結群的靈長動物，人要發展成為萬物之靈，要克服的危機比一般動物更多，更具挑戰性。因此要成為人類社會的領袖，更非要有敏銳的危機感不可。觀察世界歷史上各個民族的顯赫政治領袖，他們之所以能渡過重重危機，證明他們的危機感特別比人敏銳。證論客家族群所出的顯赫政治領袖，近代的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李登輝、與李光耀，都可說是經歷重大危機的領袖，孫中山先生在去世前，仍然不忘中華民族仍未擺脫險境，遺囑要同志們仍須努力，不然要被列強消滅。他的革命目的就是要求全世界列強以平等待我民族，由此可見他所具有的深切危機感。毛澤東的崛起正是靠他成功抓起中華民族的「救亡運動」去抵抗日本兇狠的侵略，他的整套革命理論便是建立在不停的鬥爭，認定只有鬥爭才能

生存。鄧小平的最傑出表現是早預見共產政權所面臨的危機，1979年掌政後，他力主改革，從政治掛帥的偏差扭轉去搞經濟掛帥，否則中共也會像歐洲共產政權那樣被衝垮。中共在他領導下仍能安然渡過天安門那樣的重大危機，依靠的正是敏銳的危機感老早就感受到暗藏的致命危機，提前糾正共產黨的錯誤，結果安然渡過連串危機。李登輝的顯赫政治地位是由他改革國民黨政權的工作所建立起來的，對他來說台灣暗藏了三大危機，第一是統獨之爭的危機，第二是省籍之爭的危機，第三是民主與不民主之爭的危機。不早點解除這些危機，台灣便會陷入連串政治險境。因此他掌政後，針對這三大危機，提出了他的解危方案，雖然他未必能把台灣的困境擺脫，但他的敏銳危機感已深切感染了台灣，使到台灣在他統治後人人都加強了戒備去面對這三大危機，他也因此贏得了他的顯赫地位。李光耀的例子也是典型的「敏銳危機感」的政治家，他的自傳裏已指出他生長在日本佔領下的新加坡，生命危在旦夕，使他養成了對危機有敏銳的感覺，在他從政的過程中，他也從來保持警惕，與馬共打交道如此，因此不掉進馬共的險境中，他說林清祥沒這警覺性。與英國打交道也如此，不掉進英國的險境中，他說馬紹爾與林有福沒這警覺性。與冬姑打交道，他很快警覺到種族主義的危險性，退出馬來西亞後，他學到了如何小心處理新加坡的種族問題，以免讓這個問題來摧毀新加坡的建國。他甚至公開說他培養繼承人之重要條件之一是看他具不具備敏銳的危機感。

瞭解到這些客籍領袖的敏銳危機感情況後，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來解釋他們的敏銳危機感與客家族群的特性有何關係，現在且就這個問題來進一步探討。

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客家族群本身是不是

具備危機感的一個族群，如果這個族群不具備這條件，作為其成員的客家人也就很難有敏銳的危機感了，危機感的養成，不單是靠整體社會的危機意識，還要靠整體社會身處危機的一再考驗，一次的或短期的考驗還不足以培養強烈的危機感，更不足以證明這個社會能真正經受得起考驗。要有長期經受考驗才能真正鍛鍊出敏銳危機感的族群，一旦有了長期化解危機的經驗，危機文化也就會植根在這個族群的社會結構上，然後經過文化的熏陶把危機感強烈地潛伏在族群的意識中，使到每個成員都或強或弱地感染到這種危機感的習性。這種習性一旦養成便不容易消失，即使個體家庭或個人離開這個族群，三、五代時間，也都不會輕易消失，因為由文化熏陶出來的習性既然要經歷好幾百年以上才能穩固下來，一旦穩固下來以後，也就不容易消失。這種情況可以從很多其他的文化行為證明出來，有關這點，法國的社會科學家早在法國企圖改造印度支那的越南人、柬埔寨人與老撾人的文化所遭受到的抗拒經驗中，作出了他們的研究，結論是文化行為既然由千年以上的時間去養成，要加以徹底改變也要千年以上才行，等於將地氈展開後，要將其捲回去，也須要同樣的時間。

在研究客家族群的歷史學者中，很多人都會留意到這個族群在過去將近一千年的歷史中，曾經過五次大遷移，若計算其中較小規模的遷移，數字將更驚人。在近幾年客家學的田園調查發現，在粵東、閩西、贛南地區的客家地域，有很頻密的再遷移紀錄，有的甚至由此地區向西移動，經過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陝西以至山西。據 Marry S. Erbaugh 的研究，毛澤東的長征由客家根據地的井崗山經過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最後落在延安，所經過的路線都可由客家族群的居住地區打通，長征隊員有好幾萬是客家人。儼然是近代又一次客家族群的大遷移，所不同的是這次他們沒

大批攜帶他們的家眷同行，但毫無疑義的，這些客家族群貫串起來的關係網絡，客家村落的高度危機意識，大大成全了毛澤東所走過的艱巨壯舉，史諾在其《紅星越過中國》的一書中，把這二萬五千里長征描述為人類高超意志的一次展示，這可以當作是歷史上歷次客家族群大遷移的歷史寫照。

研究客家族群的學者中，也有人指出了這樣的大遷移歷史養成了客家人堅忍不拔的個性，並認為是客家人的優越質素使其能克服重重險惡的旅程，羅香林與 Erbaugh 都有這見解。羅更進一步指出客家人所居住的上述三省的山區地理環境條件差，經常有山洪的威脅，因此長期鍛鍊客家族群的吃苦精神。這些人的研究只看到他們吃苦的一面，卻沒有進一步指出這種頻繁的大遷移與惡劣的生活條件，其實已逐漸把客家族群的危機感與危機的生活文化培植起來了。在社會學的研究中，一般學者已留意到任何移民社會都有不安全的感覺。若是這種不安全感很嚴重，而長期揮之不去，最後便會在行為上促成這個族群的堅忍不拔的精神，除非他們被險惡克服，否則便會如此，客家人之所以有危機習性便是由這種長期不斷遷移而養成的。

除了戰亂迫使客家人遷移，以及惡劣的地理環境長期出現危機的威脅外，客家族群還要面對與移居地鄰近原住民的衝突問題。根據鄭德華的研究，移居廣東的客家族群有長期與原住民衝突的紀錄，這些械鬥主要源於農耕利益的衝突，與早期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的移殖動機志在搶奪對方的資源不同，客家族以求取農耕自立為目的，不志在搶奪原住民的耕地或他們的農獲，衝突的發生很常見的是灌溉的水源問題。還有，西班牙的移殖者在移殖的過程中，為了維護自己的佔有權，建立了殖民地政權，由其宗主國作後援，以統治者身份君臨殖民地。客家族群則沒這種心態，也沒想到建立自己的

政權，即使有，也只有往中原去逐鹿，沒有想到要在移殖地建立自己的小王國。因此客家族群面對的衝突與西班牙族所面對的有本質上的不同，後者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其族人沒有長期受到危機籠罩的感受，前者則會有此感受。

正因為長期受到械鬥的危機感受，又因為不想用西班牙移殖者那樣以建立政權來消解這種安全威脅，客家族群的選擇要嘛是繼續上路，尋求新的落足點、要嘛往後退到更缺人煙的山區去開闢耕地、要嘛便是尋求與原居民妥協的辦法。這三種辦法都被用上，不管是經歷那一個辦法，都助長了客家族群的危機習性，加強了他們的危機感，養成了他們的危機文化。尤其是後一種妥協的取態，更是如此，因為採用不逃避的辦法，他們必須面對如何克服一個敵視的鄰族。由現有粵東、閩西、與贛南的村鎮分佈情況來觀察，所有土客融合而居的地方，都出現了文化融合與血緣同化的現象。文化融合的最明顯現象是客家語言的變種，像豐順縣潮客融合而出現的「半山客」語，既有潮語的根，也有客語的底。這個現象說明了雙方都有很強烈的自尊，因為強烈的自尊，使他們無法完全背棄自己向對方徹底降服，一旦雙方都有這種特性時，既不能彼此擺脫，也只有採取互相學習對方語言，因為不放棄自己語言，又不全心學習經常使用對方語言的結果，便出現了不潮不客的第三種語言了。這種妥協的過程是艱巨的，要克服對方與自己，需要經歷長期的內心鬥爭，加上受周圍土客械鬥的危機感染，這種危機感更不好受，為了妥協，還得絞盡腦汁去面對種種突發的危險事件，危機習性由此養成的經歷過程也絕不下於前兩種的逃避方法。

除了潮客的彼此面對的經驗外，閩客彼此面對的經驗也很強有力地說明了與鄰族相對的危機感受是深切的體驗，以閩西的永定經驗最可貴，這裏閩

客衝突的解決方法與潮客的妥協相處辦法不同，這裏的閩客各自建立了用於防衛的土樓，永定所見的舉世聞名的土樓便是因為面對不斷發生的閩客衝突而設計出來的。閩族也有自己的土樓，但閩族的土樓純粹用於打鬥時的防衛建築。建築用作民居的功用遠不如客族的，客族的土樓危機意識強，他們有感於安全的十足考慮，索性就把土樓建成居所，居在其中，防在其中，由此可見客族的危機心態比他族為甚。

最後談到客家族群危機文化的特徵，這可以從多方面看到。最為大家認識到的是客族的建築設計，就以土樓的設計來論，這建築設計主要考慮在防守，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但比之閩族的防守設計更有社會文化的深意，因為考慮到防守問題，客族不但想到土樓的防守物質條件，同時也想到土樓的防守人事條件。因為一旦戰事爆發，土樓內的人事關係必須要有軍隊的從屬關係，必須要有軍民共赴患難的關係，更有樓破家亡的存亡關係。考慮到此三大關係，土樓建築的居住安排，有一套的長次的從屬社會關係，社會階層分明，通過血緣家族的社會化過程，強而有力地達到了應有的社會凝聚力。這整套土樓設計可說把危機意識深入族群生活中，危機變成了他們生活文化的一部分，有強力感染的部分。除了閩西土樓的設計外，其他地區的各族建築設計，表面看來，有不同，但其採用聚族而居所出現的層次建築設計，也有防守的考慮在內。慣見的建築設計，是把同族人的家居建在一起，前列為長輩居所，次一輩的在長輩之後，成為第二行列，再次一輩以次排下去，如出現「五代同堂」便會出現前後五個排列的建築。每一排列都有共同的天井空間，可供同輩相聚合的場所，在前後排列間又有共通的長廊貫穿其間，以打通長幼輩份之間的關係。這些建築群，從橫向看每個大門代表一家，大門愈多，代表家數愈多，從縱向看每一層代表一個

世代的人家，層次愈多，代表長者長壽，後輩人多。父母輩去世後，長子媳搬上前排接上。這樣的建築設計與土樓的社會構思，防守功能一致，所不同的是防守功能可能要比土樓設計差一着，但也有守望高樓以提高警覺，這建築的另一個好處是前後層次排列的方式會給家族帶來一種人丁競爭的壓力，一面既鼓勵多生，同時也要做到多代同堂的壯盛景況。要做到這點，非要嚴格做到共同生活紀律不可。客家族群之強於培養有紀律的政治領袖，從這裏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除建築設計可以看到這種危機文化的表現外，另一個被留意到的現象是客家婦女的危機文化體現，人類學家早已發現客家婦女有不紮小足的情況，這紮小足的做法是清廷下令實行的，有強制的性質，因此曾在中國普遍實行，但卻遭受到客家婦女的抗命。客家婦女不遵命的原因是紮小足與客家婦女的文化習慣格格不入，因為客家婦女的社會習慣要擔負着大的農耕工作，下田作業，上山砍柴、要挑、要擔、要鋤、紮上了小足，便不能幹粗重工作了。因此迫於這種社會文化習慣，一時改不了，也就只有抗命了。根據近年客家研究的田園調查。在粵北地方的一些客家村落，也有紮小足的情況，這可能是受個別朝廷官員嚴勵執行行政令的結果，但這畢竟是異數。

客家婦女之所以有主持農耕的社會文化，究其原因也是出於客家族群的危機習性有關。因為男丁擔負著更緊迫的防衛工作，隨時面對械鬥的危險，因此必須做好習武的準備，這種操練工作可以佔用個人很長的時間，因此男丁也就沒法全意全心去務農。他們撇下來的農務也只好由婦女頂上。長期以來，也就養成婦女務農的文化習慣。由此文化習性也可看到客家族群的危機感是相當深切的，這種危機文化習性一旦養成，也就不易消除。即使今日所

見已不再有當年械鬥的危機，但婦女出外主理經濟職責的習性仍然不改。這種現象在東南亞也慣見，例如早年的客家婦女到了馬來半島後，都在錫礦場「洗琉璃」(淘錫礦)，在膠林割橡膠，在黃梨園耕種，在棕梠園工作，其工作量絕不下於他們的男丁。這種主外文化至今仍不改變，這無形中也就鼓勵了他們的男丁擺脫不了要關注危機根源的政治問題了。比起其他華人族群如閩南與潮州的婦女，他們就不像客家婦女那樣，而以主內文化見稱，留下的經濟作業由其男丁全責以赴。如此一來，一旦顧及一家的經濟命脈全操在自己手中，也就沒有這種閒情，閒時與勇氣去過問政治了。

除了建築設計與婦女主外的危機文化習性外，還有一個習性可以窺見客家族群的危機文化，人類學者發現在衆多的中國族群中只有客家人有將其先人的骷髏骨從墳墓挖起收藏在住家附近，用盎盛着。這做法也出於危機的習性所使然，因為一旦戰亂發生而須逃離家園時，長子便有責任背負父親的骨頭一同逃難，不管將來定居在何處，這副骨頭都得隨身安家立命，為人長子不得失責。這種將骨頭從墳墓挖起，盛之於盎的做法，是方便急難時可方便帶走，這現象明顯也是源於危機感的一種危機文化表現。

上述三個危機文化的實例，說明了客家族群的危機感已由長期生活體驗中，發展成為他們社會文化的一部分，這個危機文化既由實際危險催化出來，同時也由這個危機文化去加強他們對危機感受的敏覺能力。這個文化正如其他文化一樣，對於個體行為的作用，可在他的潛意識中左右其思想，也可在其實際行動中快速地領會到，不必要經過個人的經驗中尋找答案，因為這個危機文化會感召他，使他得到先機，作出敏捷的反應。

這種由文化鑄成的行爲，不容易在短短的三幾代人的時間消失掉，這解釋了爲甚麼即使一些客家族人已遠離了他們的祖居地而不再面對那種擺脫不了的危機時，仍然還保存他們的敏銳的危機感的能力。即使某些客家人已不在客家族群中生活，也可能忘記了客家語言或一些客家風俗習慣，但對於這

種深切的危機文化的感應能力卻不易被削弱，這也說明了像李登輝或李光耀，即使他們的客家文化行爲表面上看來已不明顯，但他們的敏銳危機感應能力卻仍然不減，這兩位顯赫政治人物也都源自著名客家土樓所在地的福建永定，這不是巧合，而是或然率高的結果。

有關本研究部之出版：

1. 鄭赤琰，《香港崇正總會與客家學開展》。
2. 王 東，《社會經濟變遷與客家人的教育》。
3. 丘權政，《論中國客家民系的形成》。

族群研究論叢主要探討有關中國各族群的歷史研究和發展方向。

有興趣的人士可向以下地點查詢：香港屯門，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電話：(852)2616-7697

傳真：(852)2465-0977

電郵：E-mail: rpeoce@ln.edu.hk

網頁：www.ln.edu.hk/eocb/

訂價：港幣 20 元/美元 3 元

作者簡介

鄭赤琰教授為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主任。鄭教授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並為該系系主任。於中大期間並創辦了「海外華人研究社」。鄭教授研究興趣主要包括海外華人問題、中國外交政策、亞洲國際關係和東南亞政府等。有關海外華人的專著包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海外華人》(1989, 與吳倫霓霞合編), 《香港與亞太區華人銀行業》(1991, 與饒美蛟合編), 《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4, 與鄭良樹合編), 《客家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4, 與謝劍合編), 《中國關係學》(1996, 與文灼非合編), 《香港回歸與兩岸關係之展望》(1999, 與王家英合編)。